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CAT/C/42/2
7 April 200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禁止酷刑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09年4月27日至5月15日，日内瓦

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
处罚小组委员会第二次年度报告*

(2008年2月至2009年3月)

* 本报告附件仅以原文英文分发。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一、导 言.....	1 - 5	4
二、小组委员会的任务.....	6 - 13	5
A.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目的	6	5
B. 小组委员会任务的主要特点	7 - 8	5
C. 小组委员会在《任择议定书》下的权力.....	9 - 11	6
D. 防范方式	12 - 13	6
三、对剥夺自由地点的查访	14 - 32	7
A. 小组委员会实地工作规划	14 - 19	7
B.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开展的查访	20 - 27	8
C. 小组委员会查访报告的公布	28 - 29	10
D. 查访中出现的问题	30 - 32	10
四、国家防范机制	33 - 42	11
A. 小组委员会与国家防范机制相关的的工作.....	33 - 39	11
B. 关于国家防范机制的问题	40 - 42	13
五、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43 - 61	14
A. 与相关联合国机构的关系	43 - 50	14
B. 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关系	51 - 56	15
C. 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57 - 61	16
六、行政与预算事项	62 - 76	17
A. 2008 年/2009 年资源	62 - 63	17
B. 小组委员会秘书处	64 - 68	18
C. 预算要求	69 - 74	19
D. 修改建议	75 - 76	21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七、组织的活动.....	77 - 81	21
A. 小组委员会全体会议	77 - 78	21
B. 制定工作方法	79 - 80	21
C. 保密和安全通信.....	81	22

附 件

一、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	23
二、小组委员会成员	25
三、2008-2009 年开展的查访	26
四、小组委员会 2009 年实地工作方案	30
五、小组委员会成员参加的与《任择议定书》相关的活动情况.....	31
六、《任择议定书》联络小组	33
七、分析《伊斯坦布尔议定书》	34

一、导 言

1. 本公开文件是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第二次年度报告。¹ 它介绍小组委员会在 2008 年 4 月初到 2009 年 3 月底所涉阶段的工作情况。²

2.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任择议定书》有 46 个缔约国和 62 个签署国。³ 其他一些国家在批准进程中远远领先,小组委员会期待着能有 50 个缔约国、而且小组委员会增加到 25 名成员。

3. 缔约国于 2006 年 10 月选举出 10 名专家作为小组委员会的独立成员,在 2008 年 10 月对两年任期到期后的 5 位成员的席位进行选举之后,保持了最初成员构成。⁴ 这些新一代联合国条约机构的成员坚定地承诺于通过小组委员会的以下授权三大支柱,防止发生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 对剥夺自由地点进行查访;
- 直接与国家防范机制开展工作;
- 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其他全球和区域国际机构以及在相关领域开展工作的国家机构开展合作。

4. 《任择议定书》第 25 条规定,“小组委员会在执行本协定书方面的开支由联合国承担”,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小组委员会依照本协定书有效行使职能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小组委员会在其第二年期间继续苦苦挣扎努力完成任务,而严重限制其发挥能力的因素有:

- 受预算资源限制每年开展防范查访三到四次,这意味着小组委员会每隔 12 年到 15 年才能查访一个缔约国;

¹ 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禁止酷刑任择议定书)于 2006 年 6 月生效之后而设立。关于《任择议定书》内容,见 www2.ohchr.org/english/law/cat-one.htm。

²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16 条第 3 款)的要求,小组委员会向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提交其公开年度报告。

³ 《任择议定书》缔约国名单载于附件一。

⁴ 小组委员会成员名单载于附件 2。

- 没有任何预算拨款用于与国家防范机制直接开展工作，尽管后者是《任择议定书》新的、与众不同的重要特点；
- 缺乏工作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缺乏连贯性以支持这一专门工作，造成小组委员会迄今为止有 12 位不同工作人员开展六次查访。

5. 小组委员会遗憾地报告说，只要目前的支助局势维持不变，它将无法充分履行授权下的各项责任。

二、小组委员会的任务

A.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目的

6. 《任择议定书》第 1 条规定设立一个由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对存在被剥夺自由者的地点进行定期查访的制度，以预防发生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认为这是一种相互挂钩的机制网络机制，相互合作开展查访及其防范授权下其他相关工作。在不同层面开展工作的查访机构之间需要发展并维持良好关系和沟通，以避免重复并使稀少的资源发挥最佳效果。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的任务在于直接与国际和国家的其他查访机制开展接触。在本报告所涉期间，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继续寻求途径促使开展防范工作的各个机构之间的协同。

B. 小组委员会的任务的主要特点

7. 小组委员会的授权载于《任择议定书》第 11 条。⁵ 它规定防止小组委员会应：

- (a) 对人们被剥夺自由或可能被剥夺自由的地点进行查访；
- (b) 关于国家预防机制；
 - (一) 在必要时就这些机制的设立向缔约国提供咨询意见和援助；
 - (二) 与国家预防机制保持直接联系，并为其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在评估需求和必要措施方面向这些机制提供咨询和援助以加强保护

⁵ 第三部分，小组委员会的授权的职权范围。

免受虐待；向缔约国提出必要建议和意见以便加强国家预防机制的能力和授权；

(c) 为预防虐待，与相关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家机构开展合作。

8. 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认为其授权三项内容对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非常重要。

C. 小组委员会在《任择议定书》下的权力

9. 为帮助小组委员会执行其授权，《任择议定书》(第 14 条)赋予其很大权力，各缔约国有义务允许小组委员会对其管辖和控制下任何确实或可能按照公共机关的命令或怂恿、或在其同意或默许下剥夺人的自由的地方进行查访。⁶

10. 缔约国还承诺准予小组委员会不受限制地得到关于被剥夺自由者的所有资料以及关于这些人的待遇和拘留条件的所有资料。⁷ 缔约国还有义务准予小组委员会在没有证人在场时私下会见被剥夺自由者。⁸ 小组委员会可自由选择准备查访的地点和会见的人。⁹ 根据《任择议定书》还赋予国家预防机制类似权利。¹⁰

11. 小组委员会在报告所涉期间得到所查访缔约国的合作继续有效行使这些权利。

D. 防范方式

12. 小组委员会的防范任务范围广泛、包括诸多因素，涉及获得被剥夺自由者在国家受到待遇或处罚的情况资料。这类因素包括：现行主要和次级立法和规则或条例的相关内容或差距；现行体制框架或官方制度的相关内容或差距；任何构成、或是不加控制可沦为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相

⁶ 《任择议定书》，第 4 条和第 12 条(a)款。

⁷ 同上，第 12 条(b)款以及第 14 条，第 1 款(a)和(b)项。

⁸ 同上，第 14 条第 1 款(d)项。

⁹ 同上，第 14 条第 1 款(e)项。

¹⁰ 同上，第 19 条和第 20 条。

关做法或行为。小组委员会对可能导致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任何因素进行审查。

13. 不管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是否在某个国家实际发生，各国始终有必要保持警惕以防范出现这种危险并且实施和维持有效的全面保障措施以保护被剥夺自由者。预防机制可发挥作用确保这类保障措施实际执行并发挥效果，同时提出建议在法律上和实践中改善保障制度，从而改善被剥夺自由者处境。小组委员会的防范方式具有前瞻性。研究良好做法及错误行为的例子时，小组委员会寻求完善现有保护，缩小理论与实践差距并消除、或尽量减少发生酷刑和其他残忍、非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可能性。

三、对剥夺自由者地点的查访

A. 小组委员会实地工作规划

14. 在其第二年工作期间，小组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2 条规定的各项原则，继续以合乎情理的程序挑选要查访国家。挑选将查访国家时可能考虑的因素包括国家预防机制的批准/制订日期，地域分配，国家的大小和复杂程度，实行中的区域预防监督工作，以及报告的具体或紧迫问题。

15. 小组委员会发现，由于预算限制，有必要将其计划查访方案限制为每年三次查访。小组委员会要明确指出，它并不认为这种定期查访的周期性足以帮助其履行《任择议定书》下授权。

16. 2008 年初，查访费用拨款后，很明显没有足够资金支助甚至已经缩减的查访方案，就是说，2008 年下半年两次查访。小组委员会决定，与其敷衍了事地进行两次规划中的查访，还不如用拨付的时间和人力资源更好地开展工作计划中的第一项访问。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将 2008 年剩下的计划查访推迟到 2009 年上半年。

17. 2008 年期间，小组委员会继续根据现有缔约国数目，制定处理查访方案战略规划的办法。小组委员会认为，经过初期发展阶段后，中期查访方案应涉及每 12 个月期间有 10 次查访。这种年度查访频率基于下述结论：为有效查访 46 个缔约国以防止发生虐待，小组委员会必须平均每 4 年/5 年对每个成员国至少访问

一次。小组委员会认为，查访次数少会影响到有效支助和加强国家预防机制发挥作用以及向被剥夺自由者提供保护。

18. 再有 4 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就将使缔约国总数达到 50，同时将要求预算资源增长并使小组委员会成员达到 25 名。¹¹ 《任择议定书》已有 62 个签署国，而且在一些情况下批准进程正顺利进行，小组委员会相信已针对上述情况做好支助计划。为此，小组委员会为人权高专办编写资料，详尽且合乎情理地介绍了其将来工作的预算计算情况(见以下第 6 节)。

19. 作为规划进程工作一部分，小组委员会要求被查访缔约国提供有关被剥夺自由者的立法以及体制和制度内容资料，及其实际运作的统计和其他资料。小组委员会感谢两位实习人员，每个人工作了 6 个月，就本报告所涉期间将查访的缔约国编写国家简况。国家简况载有丰富的最新的相关资料，采用小组委员会设计的分析框架为格式，并引用了联合国其他机构、其他国际条约机构、国家人权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来文的材料。

B.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开展的查访

20. 小组委员会于 2008 年 5 月查访了贝宁，2008 年 8 月/9 月查访了墨西哥，2009 年 3 月查访了巴拉圭。查访期间，代表团注重国家预防机制的发展进程以及各类剥夺自由地点被关押者的保护情况。¹²

21. 2009 年上半年，小组委员会宣布了当年即将开展的实地工作方案，包括对巴拉圭、洪都拉斯和柬埔寨的查访以及与爱沙尼亚的国内接触。小组委员会在计划对墨西哥和巴拉圭进行定期查访前不久还进行了初步访问，以便与当局启动对话进程。这些初步会晤证明为非常重要的查访准备工作，为调整方案改善查访代表团工作便利提供了机会。初步访问构成小组委员会查访相关工作的一部分。

22. 查访期间，小组委员会代表团根据经验调查实情并与范围广泛的对话者进行讨论，包括负责剥夺自由问题的相关部委官员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其他国家管理当局如司法或检查当局、相关国家人权机构、专业组织以及民间社会代表。如果国家预防机制已经设立，它们就是小组委员会的重要对话者。小组委员会代

¹¹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5 条第 1 款规定。

¹² 查访地点细节见附件三。

代表团对剥夺自由地点进行未经宣布查访并与被剥夺者私下会见。他们还与拘留地点的工作人员以及参加调查工作的警察进行交谈。

23. 关于查访时开展事实调查的主要办法，小组委员会从各种来源独立收集资料进行三角剖面分析，资料来源包括直接观察，访谈，医学检查以及详细阅读文件记录，以便针对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风险，以及是否存在保障措施及其优缺点，就审查的具体情况得出意见。小组委员会代表团根据查访期间交叉对比的调查结果得出结论。

24. 小组委员会在这一年里满意地注意到，一些缔约国准备或正在采用《伊斯坦布尔议定书》作为记载酷刑的工具，首先是用于打击逍遥法外现象。小组委员会分析了《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作用，不仅用于打击逍遥法外，而且用于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并且查明一些挑战所在。分析结果载于附件七。考虑到《伊斯坦布尔议定书》作为软法律文书的效用，小组委员会认为各国应促进、传播和实施《伊斯坦布尔议定书》，将其作为一种法律文书，根据充分的技术标准，采用医学和心理学报告的形式，记载被剥夺自由者遭受酷刑案件。这些报告不仅构成酷刑案件的重要证据，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防止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注意到，医生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必须切实独立于警方和关押机构，在其人力和财务资源结构，以及任命、提拔和薪水等职能都应如此。

25. 小组委员会每次定期查访结束时，代表团在保密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向管理当局口头介绍它的初步意见。小组委员会要感谢贝宁、墨西哥和巴拉圭当局接受代表团初步意见的精神，以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设的讨论。每次查访后，小组委员会向当局致函，重申主要初步意见并要求得到反馈以及自从访问以后为解决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而已经或正在采取的任何步骤的最新情况，尤其是那些可能要、或是肯定要在访问后几周内加以处理的问题。小组委员会指出，将在起草查访报告时考虑到当局作出的答复内容。

26. 在查访后，还将在晚些时候提醒主管当局，小组委员会全会通过查访报告草稿之前收到的任何答复，都将成为小组委员会讨论通过报告时的讨论内容。这些通信将成为缔约国与小组委员会之间持续进行预防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小组委员会高兴地报告说，迄今为止所进行的每次查访期间，它都收到当局对初步

意见的反馈，并且在通过每次查访报告前收到更多资料。这表明，初步查访的缔约国欢迎持续进行对话，并表明在预防领域逐步取得进展。

27. 要求主管当局对各项建议、以及对小组委员会查访缔约国的报告中希望得到更多资料的要求，以书面形式作出答复，这类报告在小组委员会通过后以保密形式转交主管当局。迄今为止所有相关当局的答复均按时送达，这一迹象清楚表明缔约国怀有与小组委员会合作的良好意愿。

C. 小组委员会查访报告的公布

28.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小组委员会关于瑞典和马尔代夫的查访报告(已收到小组委员会查访报告的五个缔约国中两个国家)，以及当局作出的答复，均放置于公共领域。¹³ 小组委员会希望，在适当时候，每个已查访缔约国当局都会要求公布将查访报告以及当局答复。¹⁴ 在此之前，查访报告仍属保密。

29. 公布小组委员会查访报告以及相关当局答复是缔约国承诺于《任择议定书》目标的表示。它使得民间社会得以考虑报告中处理的问题并与当局共同开展工作落实各项建议，以改善对被剥夺自由者的保护。小组委员会热烈欢迎瑞典和马尔代夫当局作出的公布决定。小组委员会希望其他缔约国也将效仿这一良好典范。

D. 查访中出现的问题

30. 《任择议定书》规定，根据缔约国、人权高专办以及联合国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建议编写名册选出的经证明具备专业经验和知识的专家，可陪同小组委员会成员进行查访。¹⁵ 迄今为止，已有 22 个缔约国为名册提供了专家姓名及详细情况。2008 年，联合国设立了一个小组，在缔约国提交的专家之外再挑选专家放在名册上。外部专家可帮助小组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多种多样的观点和专业知

¹³ 见 <http://www.ohchr.org/english/bodies/cat/opcat/index.htm>。

¹⁴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16 条第 2 款。

¹⁵ 第 13 条第 3 款。

有区域的专家。小组委员会依然等待专家名册出台，而在此之前将继续从缔约国提交的名单上、以及从公认具有必要相关专业知识的专家中挑选专家。在本报告所涉期间，小组委员会因预算限制，仅在一次查访中得到一位专家陪同。

31. 小组委员会一直担心查访之后可能出现报复。对那些与小组委员会代表团交谈过的被剥夺自由者，如果他们不透露接触内容可能遭到威胁，或可能因为与代表团交谈而受处罚。此外，小组委员会了解到，一些被剥夺自由者可能事先被警告不得和小组委员会代表团谈任何事情。任何官方或代表国家行事的个人作出这种行径均属违反《任择议定书》所规定的与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开展合作的义务，这点应不言自喻。此外，《任择议定书》第 15 条规定，国家有积极义务采取行动，确保不会由于小组委员会的查访而导致报复。

32. 小组委员会期待着每个被查访国家当局核查是否因为与小组委员会合作而遭受报复，并采取紧急行动保护所有相关人员。

四、国家防范机制

A. 小组委员会与国家防范机制相关的工作

33. 《任择议定书》要求各缔约国设立、指定或保持一个或多个国家查访机构，负责预防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即，国家预防机制。¹⁶ 《任择议定书》为此确定了不迟于批准后一年的时限。大多数缔约国尚未履行这一义务。

34. 小组委员会在其第二年期间与预定应该设立或保持国家预防机制的所有缔约国再次接触，鼓励它们向小组委员会通报设置国家预防机制的持续进程工作。请《任择议定书》缔约国提交资料，详细介绍设立国家预防机制的情况(法律

¹⁶ 第 17 条。

授权，组成，规模，专业知识，可动用财务资源，查访频率，等)。¹⁷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29 个缔约国就这些问题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提供了资料。¹⁸

35. 小组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许多缔约国迄今为止在国家预防机制的指 定、设立或保持方面缺乏进展。在设立国家预防机制时要求开展磋商进程方面， 在为使国家预防机制有效工作而提供必要立法基础以及切实支助、包括人力和预 算资源方面，均存在明显差距。除非国家预防机制作为防止发生虐待的现场查访 机制而发挥作用，否则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将遭受严重不利影响。

36. 过去一年里，小组委员会与国家预防机制以及各种组织开展多种双边和 多边联系，包括在授权下所有区域参与发展国家预防机制工作的国家人权机构和 非政府组织。《任择议定书》联络小组(联络小组)成员组织，¹⁹ 与非洲人权和人民 权利委员会、欧洲理事会、美洲人权委员会、欧安会/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以及 欧洲联盟委员会等区域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在世界各地举办集会，促进和协助实 施《任择议定书》，小组委员会对此表示敬意。

37. 根据一些国家预防机制提出的援助要求，小组委员会正探索途径制定一 项援助国家预防机制试点方案，它综合各种讲习班并考虑到国家预防机制查访意 见，并随后提交反馈和交流意见。讲习班模式来自于小组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期间与爱沙尼亚国家预防机制代表的会谈结果。2009 年作为试点推出，属于欧洲 理事会负责支助、防止酷刑协会所举办的一项方案的部分内容。针对小组委员会 这部分工作持续得不到任何联合国预算拨款(见以下第 6 节)的情况，小组委员会正 寻求获得这类支助，以便履行《任择议定书》下的任务。

38. 在报告所涉期间开展的查访过程中，小组委员会代表团与一些被查访国 家指定担任国家预防机制的机构代表会晤。在贝宁，对国家预防机制立法草案进 行研究并表示欢迎；国家预防机制尚未成立，小组委员会正等待这方面的进展。 在墨西哥，国家预防机制成为一系列讨论的主题，包括在复杂的联邦制度和资源 情况下有关工作方案的授权及范围的立法等问题。在巴拉圭，小组委员会赞赏地

¹⁷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3、4、11 及 12 条所查明内容。

¹⁸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所有缔约国向小组委员会提供的关于国家预防机制的指定、 设立或保持的正式资料载于小组委员会因特网站：[http://www.ohchr.org/english/bodies/ cat/opcat/index.htm](http://www.ohchr.org/english/bodies/cat/opcat/index.htm)。

¹⁹ 参加《任择议定书》联络小组的组织，见附件六。

注意到，旨在设立国家预防机制的法律草案制定工作十分公开、透明而且具有包容性。此外，法律草案内容达到《任择议定书》的最低要求，包括国家预防机制在职能方面独立的问题。小组委员会担心的是，法律草案已提交参议院立法委员会讨论达数月之久，并相信在小组委员会查访后的几周里将重新推动通过该法律。

39. 小组委员会成员还参加了一些涉及发展国家预防机制的国家、区域和国际会议。²⁰ 小组委员会成员认为这一部分任务极为重要，并因此作出所有努力，自费和/或者在联络小组的慷慨支助(包括财务资助)参与有关工作。与参预实施《任择议定书》相关工作的各个组织建立联系，给小组委员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不仅赞助小组委员会成员参预关键对话者一系列重要集会，而且协助小组成员实施制定工作方法方案(见以下第 5 节)。小组委员会对联络小组尤其在小组委员会有关国家预防机制工作方面继续提供重要支助表示感激，并愿将此记录在案。

B. 关于国家防范机制的问题

40. 《任择议定书》实施初期，小组委员会就国家预防机制的发展制定了初步指南(发表在小组委员会第一次年度报告上)。其重点在于该进程初始阶段，当缔约国开始履行其《任择议定书》之下指定、设立或保持国家预防机制的义务之时。许多缔约国在发展其国家预防机制方面仍处于这一初始阶段。

41. 小组委员会已将其重点转向国家预防机制运作情况的关键问题，以便介绍它如何开展国家预防机制的相关工作任务，从《任择议定书》第 11 条框架开始：(a) 就设立国家预防机制向缔约国提供咨询意见和援助，(b) 向国家预防机制提供培训和技术援助，以便加强其能力，(c) 在评估需求和必要措施方面向国家预防机制提供咨询和援助以加强其对剥夺自由者的保护，(d) 向缔约国提出建议和意见，以便加强国家预防机制预防发生虐待的授权和能力。

42. 在此建立信任和发展关系的初期阶段，小组委员会打算按经验办事，支助国家预防机制并以建设性的批评态度与国家预防机制以及缔约国开展合作。根据《任择议定书》的规定，通过与国家预防机制开展“直接联系”工作，小组委员会寻求考

²⁰ 关于小组委员会成员参加的有关国家预防机制活动清单，见附件五。

虑国家预防机制需求所在，以便改善其作为切实有效的预防性查访制度关键部分之一的实际职能。按照第 16 条规定，小组委员会应以机密形式向缔约国、以及必要时向国家预防机制送达其建议和意见。小组委员会认为其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建议和意见对国家预防机制有用。小组委员会很希望继续并加强与国家预防机制的直接联系，并期待着能够拨出更多资源用于这一部分重要任务(见以下第 6 节)。

五、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A. 与相关联合国机构的关系

43. 《任择议定书》为禁止酷刑委员会与小组委员会建立特殊关系，并规定两个机构每年应至少一次同期举行会议。²¹ 小组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部分会期同期举行，第二次联合会议于 2008 年 11 月 18 日举行。讨论问题包括：通过采取批准行动实施《任择议定书》；国家预防机制；国家查访及其时间安排；禁止酷刑委员会与小组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分享信息；小组委员会的公开年度报告。

44. 禁止酷刑委员会/小组委员会联络小组由来自每个条约机构的两名成员组成，它继续协助相互联络。防止酷刑协会支持这种联系并向 11 月份联合会议之前的一次会议提供资金，包括两个条约机构的主席。这使得与会者能够就两个条约机构共同重视的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协调工作交流意见。小组委员会极为赞赏禁止酷刑委员会帮助将小组委员会公开年度报告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自身年度报告一同提交大会。

45. 2008 年 11 月，大会决定禁止酷刑委员会主席和小组委员会主席将于 2009 年 10 月向大会介绍其酷刑相关工作并开展互动讨论。小组委员会热烈欢迎有此机会与大会一起处理与其任务相关事项。

46. 旨在援助缔约国落实小组委员会建议、并协助国家预防机制开展教育的特别基金(《任择议定书》第 26 条)，由人权高专办负责管理。小组委员会建议，应该有一个独立的专家董事会参预审议向特别基金提出的申请。小组委员会一直坚信，它应与该基金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将其独立预防机制作用与赞助实施其建

²¹ 《任择议定书》第 10 条第 3 款。

议相区分。小组委员会因此很高兴地得知，已经和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董事会取得联系，请其担任独立咨询委员会，以评估如何使用向特别基金的捐款。

47. 小组委员会知道，到目前为止已有马尔代夫和西班牙向特别基金慷慨提供捐助。据报道，一般来说国家在了解到小组委员会建议内容之前不愿向特别基金提供捐助。小组委员会忆及，其建议在相关缔约国同意发布查访报告前均属保密。因此，公开发表是获得资金实施建议进程的重要一步。

48. 在其全体会议期间，小组委员会成员讨论了与其他相关联合国机构关系问题并与其举行会议。尤其考虑到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与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相辅相成，小组委员会继续与曼弗雷德·诺瓦先生保持密切联系，并讨论了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工作方法问题。

49. 在其 2009 年 2 月举行的第 7 届全体会议上，小组委员会与国家机构股实地业务与技术合作司的 Gianni Magazzeni 先生举行会晤，讨论认可全国人权机构问题。全国人权机构显然认为认可工作很有价值，而小组委员会认为必须将全国人权机构的总体人权任务与国家预防机制的具体预防任务相区别。认可本身并不自动使某个全国人权机构自动具备国家预防机制资格。会上探讨了各种办法以便明确区分国家人权机制认可工作与某个具体全国人权机构是否适合发挥全国预防机制作用。

50. 小组委员会继续派代表参加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委员会间会议，这与那些其任务与小组委员会的任务实质内容相互交叉的专家们交流意见提供了良好机会。各条约机构间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小组委员会在被剥夺自由者权利方面与禁止酷刑委员会以及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授权尤其有关，同样也与儿童权力委员会的工作有关，其中包括被剥夺自由儿童的权利，同时还与对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工作有关，涉及被剥夺自由妇女的权利。小组委员会曾在其查访报告中提到禁止酷刑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及儿童权力委员会。

B. 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关系

51. 小组委员会还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保持联系，两个条约机构继续在许多工作相关领域保持积极对话。

52. 《任择议定书》规定，小组委员会应与区域公约下设机构举行磋商以便相互合作避免重复，从而有效促进实现《任择议定书》防止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各项目标。²²

53. 在报告所涉期间，小组委员会与美洲人权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两个机构就协调指南开展工作。美洲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应邀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小组委员会一次工作组会议，而小组委员会一位成员代表小组委员会参加美洲人权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拉丁美洲防止酷刑的一次公共听证会和全体会议。这些会议提供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机会，重点在于各自机构的工作以及国家预防机制相关最新发展。

54. 小组委员会同样继续与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密切接触。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每年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小组委员会成员在每次会议期间都与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主席团以及执行秘书会晤。此外，小组委员会秘书于2008年7月21日至22日在斯特拉斯堡会见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执行秘书以及秘书处其它成员。这些都是交流想法和信息的重要场合。小组委员会以及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计划参加一系列旨在帮助发展国家预防机制的实地培训/能力建设活动。该方案由欧洲理事会主持并由防止酷刑协会负责实施。

55. 小组委员会与两个区域国际机构关注确保避免区域范围开展的防范工作方案出现重复，并致力于在共同的缔约国国内使防范性查访制度发挥最大影响。

56. 小组委员会还继续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在多次区域会议上保持密切接触，并且于2009年上半年参加了在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塞尔维亚举行的研讨会。

C. 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57. 在报告所涉期间，小组委员会与从事加强保护所有人免遭酷刑工作的国际和国家非政府组织²³ 密切接触开展工作。

²² 第11条(c)款和第31条。

²³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11条(c)款。

58. 小组委员会与防止酷刑协会在日内瓦定期举行会议。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一直向小组委员会提供支助和咨询意见，在小组委员会全会期间以及年度报告所涉整个阶段都是如此。小组委员会尤为感谢防止酷刑协会提供急需资金及其它支助以帮助小组委员会更好地与其他条约机构、国家预防机制以及非政府组织发展关系。否则，小组委员会本来不可能推动开展这些活动。小组委员会继续利用防止酷刑协会提供的宝贵资料和信息，用于筹备查访活动以及与国家预防机制开展互动。

59. 小组委员会一直与布里斯托大学《任择议定书》项目保持密切联系，并就一些对小组委员会工作非常重要的问题交换看法和意见。该项目小组参与安排区域活动，并对小组委员会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外部学术观点，小组委员会对此十分感激。

60. 《任择议定书》联络小组继续向防止酷刑小组委员会提供援助、咨询意见和支助，包括财务支助，尤其是帮助小组委员会成员参加《任择议定书》相关重要会议(见以上第 39 段以及以下附件 5)。小组委员会每次举行全体会议期间均与联络小组会晤。这是交流信息和想法的非常重要的正式机会，此外还与联络小组各个组织开展众多非正式联系和通信来往。小组委员会赞赏联络小组提供的支助和表现出的兴趣，这极大地有助于小组委员会制定工作方法并帮助其开展国家预防机制相关工作。

61.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民间社会继续帮助推动批准或加入《任择议定书》以及开展实施进程。

六、行政和预算事项

A. 2008/2009 年资源

62. 《任择议定书》第 25 条规定，“小组委员会在执行本议定书方面的开支由联合国承担”，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小组委员会依照本议定书有效行使职能提供必要的工作人员和便利。”

63. 小组委员会 2007 年开始工作以来，一直没有得到任何联合国资金开展国家预防机制相关任务，而且直到 2009 年底的时期内预计这一工作也不会得到任何

资金。在小组委员会开展活动头三年的重要时刻，联合国对小组委员会国家预防机制工作提供的支助将只限于在日内瓦开展联络，在三次为期一周的全体会议上、或是小组委员会查访期间。鉴于从小组委员会成长到 2009 年年底期间只有可用于 9 次查访的资金，小组委员会在这头三年期间只能查访不到五分之一的缔约国及其国家预防机制。小组委员会一直试图找到创新选择办法支助其这一领域的重要工作，并且提出详细建议合乎情理地要求修订 2010-2011 年两年期最初预算设想(见以下 C 部分)。

B. 小组委员会秘书处

64. 2008 年 5 月，在其头 15 个月工作期间换了一连串代理秘书之后，小组委员会欢迎其第一届秘书 **Patrice Gillibert** 先生的到来。小组委员会秘书已证明为一宝贵财富，参加了在其到任后举行的三次查访，并努力改善组织结构以及小组委员会可动用的支助。小组委员会还欢迎一位新的行政助理到任，行政助理工作效率很高、又颇有耐心，帮助小组委员会处理内容广泛的组织事项。

65. 小组委员会愿记录在案的是，它深为感激 **Kukka Savolainen** 女士，她是借调人员，在人权高专办为小组委员会工作直到 2009 年 3 月。从 2007 年 4 月以来她是主要的连续工作人员，对起草全会报告和查访报告作出了宝贵贡献。她对小组委员会的支助证明，连续性、技能以及对小组委员会工作特别内容的了解具有很高价值。

66. 关于迄今为止已进行的小组委员会六次查访，小组委员会与人权高专办总共 12 名不同成员开展工作。小组委员会感谢相关个人努力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小组委员会强烈认为，不了解小组委员会查访活动、或是未接受相关培训的新手参加每次新的查访活动，都会使相关人员处境相当不利并承受巨大压力。小组委员会对被剥夺自由者地点的查访要求具备具体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这种查访由其性质所决定会遇到困难局面，可能使不熟悉工作者面临风险。每次查访活动都有新手参加无助于有效开展防范性查访，不管相关个人可能多么具有献身精神。这不是支助小组委员会开展查访活动的专业做法。

67. 2008 年期间，小组委员会起草第 2 份查访报告过程中遇到严重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参加那次查访活动的工作人员在查访后继续为小组委员会工作、或是

可以协助起草工作。结果是，2007 年 12 月对马尔代夫进行查访，其报告草稿直到 2008 年 11 月才编写完毕提交全会审议。

68. 小组委员会相信，将来小组委员会有可能受益于过去有小组委员会查访经验、并表明自己适应于实地开展这种具体类型活动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支助。为此，小组委员会期待得到一个适宜的秘书处。小组委员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建议设立一个由 4 名经过适当培训、并且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核心小组，这是 2007 年 4 月与当时的高级专员开会商定的。²⁴ 一个核心小组将有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人员连续性，对参与查访以及规划查访和起草查访报告工作都是如此。小组委员会成立时，缔约国数目比现在要少得多，而这一数目持续迅速增加。应随着缔约国数量增加而重新审议工作人员配备问题。

C. 预算要求

69. 小组委员会一直与人权高专办负责预算和工作人员配备部门开展讨论，以便根据《任择议定书》要求获得预算帮助其执行任务。小组委员会感谢该部门人员向其提供有关小组委员会查访活动费用的相关信息，这使得小组委员会得以更为明确了解空缺所在。

70. 小组委员会认为很有必要修订最初预算中的那些不合时宜的假设基础，正如第一次年度报告所指出，这些假设有几处重要遗漏，只考虑到 4 次定期查访，每年每次为期 10 天，以及两次短期后续查访(每次 3 天)。²⁵ 在此基础上，小组委员会每隔 12 年才能对现有 46 个缔约国进行一次定期查访。

71. 《任择议定书》规定每次查访至少应有两名小组委员会成员。最初预算假设中，最低数目成为最高数目；最初预算假定查访只有两名小组委员会成员、两名秘书处人员以及两名外部专家参与。根据小组委员会成员对预防查访工作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经修订的小组委员会建议所依据的假定是，平均每次查访需要 4

²⁴ 两名 P4，两名 P3 员额，再加一名一般事务员额。

²⁵ 由于小组委员会远远未能甚至对大多数缔约国进行首次查访，目前阶段后续查访并非优先考虑。

名小组委员会成员。但两名外部专家以及两名秘书处工作人员对大多数查访来说基本够用。

72. 2008 年夏季，小组委员会进行了 4 次查访后，联合国决定小组委员会所有查访活动必须有联合国安保人员陪同，而且该工作人员的开销必须来自小组委员会预算。小组委员会理解有必要考虑实地工作期间的安保情况。小组委员会成员进行查访时并不在联合国保险范围内，但是查访开始之前获得高级别联合国安保证书。小组委员会注意到某些国际预防机制在区域基础上开展工作，主要有防止歧视协会，并在没有安保人员陪同下进行查访。小组委员会认为，对安保人员的需求应在个案基础上评估，并适当注意所涉风险及其预算影响。小组委员会建议，由于这一额外开支并不包括在小组委员会查访预算的假设中，因此应收入今后所有预算拨款内。

73. 小组委员会经修订的建议还包括拨款用于查访口译工作，这也在最初预算假设中忽略了。不言而喻，口译服务是查访被剥夺自由者地点的必要部分，而且也是主要开支因素。最初预算假设严重低估小组委员会查访的实际费用，而且顶多只适用于规模较小国家，不存在联邦制度或是没有大批被关押人口等等复杂因素，这只是其中两点。

74. 经修订的提议处理了小组委员会格外关切的一个问题：经常预算中先前缺少具体拨款用于小组委员会执行与国家预防机制直接联系的任务。在国家预防机制发展的重要初期阶段，每个缔约国有义务指定/设立和/或保持国家预防机制，而小组委员会必须有能力和国家预防机制开展工作。小组委员会持续收到要求，要其参加国家预防机制发展相关活动并提供援助。这类活动一直没有得到联合国批准供资。小组委员会一直尽可能努力对这类请求作出积极反应，动用外部来源提供的慷慨支助，尤其来自联络小组的成员组织的支助。小组委员会认为这一工作是其授权组成部分，并注意到它反映在人权高专办的年度报告中，其中提到小组委员会支助国家预防机制的工作。²⁶

²⁶ 人权高专办 2007 年年度报告，第 21 页。

D. 修改建议

75. 鉴于上述种种考虑，在预算不足、而且充满对小组委员会任务的性质和内容的错误假设的情况下，小组委员会继续苦苦挣扎开展工作。小组委员会因此认为它尚且无法履行其任务。为此原因，它提出详细计划和建议，精心说明其今后工作方案以及 2010-2011 年两年期相关预算要求。

76. 小组委员会认为，显然在此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只对预防机构查访制度的做法只说空话，要么注入必要的大量资金。防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不是费用不变的事情。

七、组织的活动

A. 小组委员会全体会议

77. 在本报告所涉 12 个月期间，小组委员会举行了三届会议，每次为期一周，分别为 2008 年 6 月 23 日至 28 日，2008 年 11 月 17 日至 21 日，以及 2009 年 2 月 8 日至 14 日。这些会议用于规划查访，与将查访缔约国代表会晤以及通过查访报告。相当重视战略规划以及挑选今后查访国家。

78. 各届会议还包括审议和讨论涉及筹备实地活动的缔约国和国家预防机制以及代表团相关情况，与联合国系统内以及在预防虐待领域积极活动的其他组织的代表会晤，以及完善一系列资料以便介绍有关小组委员会基本情况。

B. 制定工作方法

79. 小组委员会认为，制定工作方法是其持续开展活动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接连不断的工作压力意味着每年 3 次全会、每次为期 5 天的时间不足以适当讨论小组委员会工作期间出现的政策问题以及审议逐渐改变的工作方法。小组委员会成员以及秘书处工作人员在全会之后利用星期六时间处理这一非常重要的持续发展问题。小组委员会在制定工作方法过程中得到联络小组的组织成员的工作支持，而且得到防止酷刑协会的切实帮助，小组委员会对此深表感激。

80. 小组委员会作为完善其工作方法进程的一部分继续努力修改查访指南。小组委员会每次查访情况不同，取决于，除其他外，缔约国内现存结构的复杂性(如联邦国家，剥夺自由责任的转移)以及在不同类型关押环境的人员数量。查访工作方法在不断演变，并取决于有关查访的持续情况介绍及反馈。

C. 保密和安全通信

81. 在实现安全通信系统方面取得了进展，以便利就属于小组委员会授权范围的保密事项进行安全的讨论和交换数据。这种系统非常重要，考虑到需要保护向小组委员会提供信息者以及保护小组委员会获得的个人数据，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使个人面临严重危险，同时涉及履行义务对已查访缔约国相关所有资料和意见实行保密。2008年，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着手帮助小组委员会成员获得安全的因特网设施，GROOVE，它允许在严格保密情况下审议和讨论文件。这一工作于2009年上半年全面完成，极大地有助于起草和审查文件的工作，并提高小组委员会工作效率。小组委员会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它能够根据工作性质需要在保密情况下交流信息。

Annex I

**STATES PARTIES TO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S OF
31 MARCH 2009**

Participant	Signature, Succession to signature (d)	Ratification, Accession (a), Succession (d)
Albania		1 Oct. 2003 (a)
Argentina	30 April 2003	15 Nov. 2004
Armenia		14 Sept. 2006 (a)
Austria	25 Sept. 2003	
Azerbaijan	15 Sept. 2005	28 Jan. 2009
Belgium	24 Oct. 2005	
Benin	24 Feb. 2005	20 Sept. 2006
Bolivia	22 May 2006	23 May 2006
Bosnia and Herzegovina	7 Dec. 2007	24 Oct. 2008
Brazil	13 Oct. 2003	12 Jan. 2007
Burkina Faso	21 Sept. 2005	
Cambodia	14 Sept. 2005	30 March 2007
Chile	6 June 2005	12 Dec. 2008
The Congo	29 Sept. 2008	
Costa Rica	4 Feb. 2003	1 Dec. 2005
Croatia	23 Sept. 2003	25 April 2005
Cyprus	26 July 2004	
Czech Republic	13 Sept. 2004	10 July 2006
Denmark	26 June 2003	25 June 2004
Ecuador	24 May 2007	
Estonia	21 Sept. 2004	18 Dec. 2006
Finland	23 Sept. 2003	
France	16 Sept. 2005	11 Nov. 2008
Gabon	15 Dec. 2004	
Georgia		9 Aug. 2005 (a)
Germany	20 Sept. 2006	4 Dec. 2008
Ghana	6 Nov. 2006	
Guatemala	25 Sept. 2003	9 June 2008
Guinea	16 Sept. 2005	
Honduras	8 Dec. 2004	23 May 2006
Iceland	24 Sept. 2003	
Ireland	2 Oct. 2007	
Italy	20 Aug. 2003	
Kazakhstan	25 Sept. 2007	22 Oct. 2008
Kyrgyzstan		29 Dec. 2008

Participant	Signature, Succession to signature (d)	Ratification, Accession (a), Succession (d)
Lebanon		22 Dec. 2008 (a)
Liberia		22 Sept. 2004 (a)
Liechtenstein	24 June 2005	3 Nov. 2006
Luxembourg	13 Jan. 2005	
Madagascar	24 Sept. 2003	
Maldives	14 Sept. 2005	15 Feb. 2006
Mali	19 Jan. 2004	12 May 2005
Malta	24 Sept. 2003	24 Sept. 2003
Mauritius		21 June 2005 (a)
Mexico	23 Sept. 2003	11 April 2005
Moldova	16 Sept. 2005	24 July 2006
Montenegro	23 Oct. 2006 (d)	6 March 2009
Netherlands	3 June 2005	
New Zealand	23 Sept. 2003	14 March 2007
Nicaragua	14 March 2007	25 Feb. 2009
Norway	24 Sept. 2003	
Paraguay	22 Sept. 2004	2 Dec. 2005
Peru		14 Sept. 2006 (a)
Poland	5 April 2004	14 Sept. 2005
Portugal	15 Feb. 2006	
Romania	24 Sept. 2003	
Senegal	4 Feb. 2003	18 Oct. 2006
Serbia	25 Sept. 2003	26 Sept. 2006
Sierra Leone	26 Sept. 2003	
Slovenia		23 Jan. 2007 (a)
South Africa	20 Sept. 2006	
Spain	13 April 2005	4 April 2006
Sweden	26 June 2003	14 Sept. 2005
Switzerland	25 June 2004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1 Sept. 2006	13 Feb. 2009
Timor-Leste	16 Sept. 2005	
Togo	15 Sept. 2005	
Turkey	14 Sept. 2005	
Ukraine	23 Sept. 2005	19 Sept. 2006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26 June 2003	10 Dec. 2003
Uruguay	12 Jan. 2004	8 Dec. 2005

Note: The 46 States parties do not include the 62 States having achieved signature or succession to signature, but not having achieved ratification of, or accession or succession to, the OPCAT.

Annex II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ON PREVENTION OF TORTURE

Expiration of Term

- Ms. Silvia Casale December 2012
- Mr. Mario Luis Coriolano December 2012
- Ms. Marija Definis Gojanović December 2010
- Mr. Zdenek Hajek December 2012
- Mr. Zbigniew Lasocik December 2012
- Mr. Hans Draminsky Petersen December 2010
- Mr. Victor Manuel Rodriguez-Rescia December 2012
- Mr. Miguel Sarre Iguiniz December 2010
- Mr. Wilder Tayler Souto December 2010
- Mr. Leopoldo Torres Boursault December 2010

Mr. Rodriguez-Rescia is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SPT, with Messrs Coroliano and Petersen as Vice Presidents, as from February 2009. From February 2007 to February 2009, Ms Casale was President of the SPT, with Messrs Petersen and Rodriguez-Rescia as Vice Presidents.

Annex III

VISITS CARRIED OUT IN 2008-2009

1. First periodic visit to Benin: 17-26 May 2008

Places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visited by the delegation:

Police facilities

(a) Police stations

Commissariat Central de Cotonou

Commissariat Central de Porto-Novo

Commissariat de police de Dantokpa

Commissariat de police de Dodji

Commissariat d'arrondissement de Ouando

(b) Gendarmeries

Compagnie de Gendarmerie de Cotonou - Brigade Territoriale de Godomey

Brigade de Gendarmerie de Zogbodomey

Brigade Territoriale et de Recherches de Porto-Novo

Brigade Territoriale et de Recherches de Bohicon

Brigade de Gendarmerie de Séhoué

Prisons

Prison civile de Cotonou

Prison civile d'Akpro-Misséréte

Prison civile d'Abomey

Other institutions

Palais de Justice d'Abomey

2. First periodic visit to Mexico: 27 August-12 September 2008

Places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visited by the delegation:

Police facilities

In the Federal District:

National Federal Preventive Custody Unit
Federal Agency for Holding Cells (Calle Liverpool)
Agency No. 50

In Jalisco: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holding cells
Preventive-custody unit, 2750 Avenida Cruz del Sur
Office of the State Attorney-General (Calle 14)
Principal holding unit, Municipal Police

In Nuevo León:

State Investigation Agency, Office of the Attorney-General (“Gonzalito”)
Alamey Municipal Police

In Oaxaca:

Municipal Preventive Police
Office of the Attorney-General, holding cells
Elite Police Force (preventive custody)

Prisons

In the Federal District:

Oriente prison

In Mexico State:

Molino Flores Prevention and Social Rehabilitation Centre

In Jalisco: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ntre for Women
State of Jalisco Pretrial Detention Centre, Puente Grande
Puente Grande Social Rehabilitation Centre

In Oaxaca:

Santa María Ixcotel prison
Valles Centrales regional prison

Military establishments

Military prison No. 1, Federal District

Juvenile centre

Monterrey Secure Unit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Juvenile Offenders
Department for the Enforcement of Measures for Juveniles,
Oaxaca Guardianship Council

Psychiatric facilities, with a focus on conditions

In Oaxaca

Annex to Zimatlán prison

Cruz del Sur psychiatric hospital

3. First periodic visit to Paraguay: 10-16 March 2009

Places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visited by the delegation:

Police facilities

Jefatura de Policía Metropolitana (Asunción):

Comisaría 3°

Comisaría 5°

Comisaría 9°

Comisaría 12°

Comisaría 20°

Comisaría de Mujeres

Jefatura de Policía Central:

Comisaría 1° de San Lorenzo

Comisaría 9° de Limpio

Jefatura de Policía Amambay:

Comisaría 3° de Barrio Obrero, Pedro Juan Caballero

Jefatura de Policía San Pedro:

Comisaría 8° de San Estanislao

Agrupación Especializada de la Policía Nacional

Prisons

Penitenciaría Nacional de Tacumbú

Penitenciaría Regional de Pedro Juan Caballero

Psychiatric facilities

Hospital Neuropsiquiátrico

Annex IV

**PROGRAMME OF THE WORK OF THE SUBCOMMITTEE
ON PREV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FIELD FOR 2009**

- Visit to Paraguay:** (first half of 2009)
- Visit to Honduras:** (second half of 2009)
- Visit to Cambodia:** (second half of 2009)
- In-country engagement in Estonia:**(during 2009)

Annex V

PARTICIP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SUBCOMMITTEE ON PREVENTION OF TORTURE IN OPTIONAL PROTOCOL-RELATED ACTIVITIES

Africa

Southern African Region

Regional Conference on the OPCAT, organized by the Bristol University OPCAT Project with APT, FIACAT,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Cape Town, April 2008. (Silvia Casale, Zdenek Hajek, and Victor Rodriguez Rescia).

Americas

Central American Region

Regional Central American workshop on strateg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ratifi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CAT. Tegucigalpa, Honduras, October 2008. (Hans Draminsky Petersen, Victor Rodriguez Rescia and Mario Coriolano).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OPCAT and Federal States: Challenge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organized by the APT, CEJIL, la Secretaria de Derechos Humanos, Ministerio de Justicia, Seguridad y Derechos Humanos, Presidencia de la Nación, 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Comercio Internacional y Culto, Presidencia de la Nación. Buenos Aires, September 2008. (Mario Coriolano, Miguel Sarre Iguinez and Patrice Gillibert, SPT Secretary).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orocco

Regional conference on OPCAT, organized by the APT. February, 2009. (Silvia Casale).

Asia-Pacific

Cambodia

Workshop on OPCAT, organized by RCT. January, 2009. (Hans Draminsky Petersen).

Europe

OSCE region

OSCE seminar on monitoring. Ankara, May 2008. (Marija Definis Gojanovic and Zdenek Hajek).

Human Dimension Meeting on prevention of torture, death penalty and combating terrorism, organized by the OSCE/ODIHR. Warsaw, October 2008. (Zbigniew Lasocik).

OPCAT in the OSCE region: What it means and how to make it work. Reg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Bristol OPCAT Project with the OSCE/ODIHR. Prague, November 2008. (Silvia Casale, Zdenek Hajek).

Kyrgyz Republic Civil Society Seminar organiz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Bishkek, Kyrgyz Republic, March 2009. (Zdenek Hajek).

Ireland

Roundtable meeti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NPM, organized by the Irish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Dublin, May 2008. (Hans Draminsky Petersen).

Poland

Lecture on prevention of torture for lawyers, organized by Helsinki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Poland, October 2008. (Zbigniew Lasocik).

Republic of Moldova

Workshop for the Moldovan NPM, organized by the AP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Chisinau, January 2009. (Zbigniew Lasocik).

Serbia

Seminar on prevention of torture in Serbia, organized by the Protector of Citizens of Serbia, the Council of Europe and the OSCE Mission for Serbia. Belgrade. March, 2009. (Marija Definis Gojanovic).

Spain

Inaugural Conference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Preventive Mechanism. Barcelona, March 2009. (Silvia Casale).

Annex VI

OPTIONAL PROTOCOL CONTACT GROUP

Amnesty International (AI)

Associa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PT)

Action by Christians for the Abolition of Torture (FIACAT)

Bristol University OPCAT project

Mental Disability Advocacy Centre (MDAC)

Penal Reform International (PRI)

Rehabilit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 for Torture Victims (RCT)

World Organization against Torture (OMCT)

Annex VII

ANALYSIS OF THE ISTANBUL PROTOCOL

Introduction

1. The Istanbul Protocol is a United Nations manual on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documentation of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and legal proceeding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unity and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 proceeds from the medical perspective.
2. Considering the validity and usefulness of the Istanbul Protocol as a soft law instrument, the SPT is of the view that States should promote, disseminate and implement the Protocol as a legal instrument to document torture cases of people deprived of their liberty through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ports drafted under adequate technical standards. These reports can not only constitute important evidence in torture cases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y can contribute to the prevention of cruel, 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 The Subcommittee on Prevention of Torture notes that it is crucial that doctors and other health professionals be effectively independent from police and penitentiary institutions, both in their structure -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 and function - appointment, promotion and remuneration.
3. The SP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since the Istanbul Protocol is a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the provis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must be a minimum standard for the definition of torture. Article 1 of the Convention states that “torture means any act by which severe pain or suffering, whether physical or mental, is inflicted intentionally ...”.
4. Thus, extension of the definition by e.g. adding that the victim’s life or function of vital organs must have been endangered is inappropriate.
5. The Istanbul Protocol gives detailed guidance for medical/psychological professionals for the best standard of the examination of a person who alleges to have been tortured or ill-treated.
6. The basic principle in the appraisal of the veracity of allegation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s to inquire into:
 - (a) The medic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orture;
 - (b) The subjective state of health/presence of symptoms during torture and in the ensuing period of time; and
 - (c) Perform a profound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if necessary refer the person to specialised examinations like various kinds of scans;
 - (d) In conclusion, the degree of concordance/agreement between those elements is determined.

7. The result of the medical/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can be graduated from, e.g.: exposure to torture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 high level of agreement; or parti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information - with or without objective signs of pathologies (physical and or mental); to disagreement.

8. However, a number of reserva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g., impaired memory of the victim and psychical inhibitions, ailments that are prevalent in many victims of torture.

9. The SPT notes that with the methods of torture normally used in times of peace, physical marks are most often unspecific or even absent. The presence, the nature and degree of severity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illness after torture vary, depending not only on the nature of the torture, but also, e.g. on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titution and background of the victim and the existence of co-morbidity.

10. Thus, the SP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often existence of torture can neither be proved nor disproved through a medical/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the Istanbul Protocol.

Contextualization of the Istanbul Protocol

11. In the fight against impunity the Istanbul Protocol is a useful tool in the appraisal of allegations of torture. The result of the medical/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is a piece of evidence together with other evidence.

12. The examination can never identify the torturers. This would rely on other evidence.

13. In a court case the judge may decide that the whole of the evidence is not sufficient to convict implicated officers.

14. The SPT notes that acquittal of an implicated officer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statements of torture were false, but only that the whole of the evidence was not strong enough to lead to conviction. The decision of the judge is based on the sum of evidence on two levels:

- Whether torture had happened
- Whether the evidence was strong enough to convict particular persons

15. The SPT finds it necessary that judges, lawyers and public prosecutors who deal with cases of possible torture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Istanbul Protocol so that they can assess compliance of the examination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Protocol and underst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medical/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basis for it.

16. However,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the examination should only be contested by medical/psychological experts with reference to objective deficiencies and errors.

17. Unless the medical/psychological experts conclude that there were gross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 various pieces of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not be ascribed to e.g. the mental state of

health of the complainant, a court acquittal of accused officers should never be taken a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allegations were false, only that the evidence was not sufficient to lead to conviction.

18. In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 the Istanbul Protocol can be an important tool provided that it is contextualized to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doctors working in places of risk, first of all those doctors who work in institutions where detainees are held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19. The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 24 of the Body of Princi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 of 1988 states that “a proper medical examination shall be offered to a detainee or imprisoned person as promptly as possible after his admission to the place of detention”.

20. In many countries this principle is implemented. This routine medical examination should:

- Be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a format
- The format should include all the items below and should be filled in by the doctor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detainee
- A medical history
- Allegations of exposure to recent violence and ill-treatment by the police or other persons
- A description of present health/subjective symptoms at the time of examination; and
- A thorough medical examination with an inspection of the whole surface of the body
-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doctor should assess whether alleged torture/severe ill-treatment could have happened

21. In the examination and the assessment of the possibility of exposure to torture/severe ill-treatment the medical doctor should have a proactive attitude.

22. The medical doctor working in police and detention facilities has a key role and should have training in the principles of documenting and reporting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23. There should be clear lines of command on when, how and to whom he should report cases of alleged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The first step in the doctor’s reporting should be to send a copy of the report to his superior -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detainee.

24. If no consent from the detainee exists, the doctor should take out any information that could identify the detainee and report to a central register, cited below.

25. The superior should decide -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prosecutor - whether there are grounds for a disciplinary inquiry or a criminal investigation by independent bodies.
26. The superior should report the case and the decision to inquire or investigate to the ministry responsible for the police and to the central register.
27. Not only in cases of allegations of torture, but also in cases where the detainee have remarkable lesions or a high number of lesions without allegations of torture/ill-treatment, the doctor should note the detainee's account of their origin in the medical file and send a copy of the medical file to his superior.
28. Such reports should be compiled in the data base below and classified as a case of violence of other than torture or of uncertain origin.
29. In all cases where the doctor assesses that torture or severe ill-treatment *could have* happened, the detainee should be offered a thorough medical/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by trained experts according to the Istanbul Protocol to take place within a time limit that permits the experts to assess superficial physical lesions possibly caused by torture/severe ill-treatment, i.e. within a week.
30. The SP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ll allegations of torture and severe ill-treatment, and cases of multi-traumatization of uncertain origin cited above, should be registered in a data base with information about - among other items:
- Hour date and place of alleged ill-treatment
 - The security body implicated and if possible characteristics of involved officers
 - Place of apprehension and detention
 - Nature of the allegations
 -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medical examination by the doctor in the police facility
 -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and the conclusion of the expert medical/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 Details of an inquiry and the result hereof
31. The SP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a proactive compliance with such a programme by doctors in police and detention facilities would have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preventing torture. The proactive attitude to examining cases of possible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should be made known to all police office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would deter many officers from resorting to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32. A database as outlined would be a useful tool for the authorities to analyse the problem of torture including identifying risk factors, in order to better prevent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Final remarks

33. The SPT underlines that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of torture is not a reliable indicator of the real prevalence of the problem. Complicated complaint procedures and risk of reprisals may diminish the number drastically.

34. The SPT notes that one of the objectives of torture is to break down the victim, e.g. to make him confess to a crime or to give information. It follows that most victims of torture do not have the necessary mental strength to enter into bureaucratic technicalities and lengthy procedures with interviews lasting several days. It also follows that the doctor working in police facilities apart from being proactive should always - on an informed basis - respect a possible victim of torture's wish not to be referred to expert examination and an eventual wish to have information for the database sent in a manner that cannot identify the detainee directly.

35. In police custody a complainant should be safeguarded against direct reprisals from implicated officers through the maintenance of medical confidentiality.

36. In the system of justice the complainant should be safeguarded against reprisals, e.g. charges with defamation of authorities in case the medical/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fails to positively demonstrate exposure to torture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 (see classification above).

-- -- -- -- --